
湖南抗战述论

范忠程

在八年抗战中,湖南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抗战初期,湖南军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力支援前方抗战。武汉沦陷后,湖南由后方变成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场。湖南战场的军事抗战,持续时间近六年之久,消耗了侵华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挫败了敌军迅速占领湖南、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作战计划,有效地支援了全国的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湖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奉献和牺牲。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湖南战场的概貌及其在全国抗战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十分了解。本文现就此作些论述。

湖南抗战的发动与组织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动员湖南人民参加抗日救亡做了大量的组织与发动工作。广大城乡、社会各界,大都动员起来,湖南涌现出以长沙为中心、辐射全省的全民性抗日救亡运动。

7月9日,长沙各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日军进犯卢沟桥和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消息,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号召“国人迅速抵御外侮!”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全力援助

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① 中共中央军委特科长沙工作组负责人刘道衡，中共长沙青年党团书记赵君实及成员刘乐扬、梁苏宜，长沙文教界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毛达恂、孙伟、潘开茨，以及七七事变前夕从平、津、沪等地高校回湘的中共党员学生曹国智、肖敏颂、曹国枢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抗战方针，动员湖南民先队队员和救国会成员，在工人、学生、店员、妇女、文化界和机关职员中，开展抗日的组织和发动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救亡团体，支援前方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5日至20日在庐山举行暑期谈话会，邀集全国各党派、各团体的代表和学者名流150余人，商讨抗日救国事宜。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国民党省党部代表赖琏，省财政厅长尹任先，湖南文化界名人朱经农、黄士衡、曹典球等参加了谈话会。湖南《大公报》、长沙《勤报》等当即刊登了蒋氏庐山谈话的内容。蒋介石的谈话表明了他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严正立场和准备抗战的态度。这个谈话对开放民众救亡运动，推动全国抗战，特别是动员各级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民党湖南省党政当局，开始改变过去压制、禁止群众抗日救亡的错误政策。7月18日，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出面，邀集省民众教育馆、省农民教育馆、省人民提倡国货救国会、省民众常识指导会、省会民众国术俱乐部、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和市政府等八个单位，发起成立长沙市人民抗敌后援会，24日扩大为湖南省人民抗敌后援会，宣布：“本会以统一湖南人民意志，集中力量在党政上级机关指导下，努力抗战工作。”提出：“抱定决心长期抗战，团结精神严守纪律，镇定沉着安定后方，肃清汉奸以消隐患，捐款劳军毁家纾难”等作为该会的宗旨。该会推文教界知名人士陈润霖、王季范、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278页。

胡元祜等 19 人为常委。^①

在国共两党的组织发动下,具有反帝革命传统的湖南人民,迅速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7月9日,长沙铁路工人率先成立了慰劳前方将士办事处,开展抗日募捐活动。省会邮电员工电勉卢沟桥爱国官兵奋勇杀敌,表示“长沙全体邮电工人誓为后盾!”13日,湖南大专院校成立了湖南学生援助前方将士委员会(不久更名为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学抗会),电励前线官兵“坚持抗日”,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开放民众救亡运动,动员全国军队抗战。随后,湖南省农会、省农村建设学会、省商会筹备会等群众团体,纷纷电慰英勇杀敌的前方将士,积极开展抗日募捐。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是湖南成立最早的群众性救亡团体之一。它的活动虽曾受到国民党省党部的约束和限制,但它在抗日募捐、救护伤员和组织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年8月至10月,该会为前方将士共募款68万元,布鞋4万双,棉背心1.5万件,毛巾13万余条,药品32箱,铁锹铁镐6000件。

淞沪抗战爆发后,湖南人民掀起了支援上海抗战的热潮。除了加强抗日宣传动员、增产节约、捐钱捐物支援前线外,湖南的工人、学生、妇女、教师、职员、退伍军人,自动组织敢死队、义勇队、汽车队、战地服务团和慰劳队,奔赴淞沪前线支援抗战,1937年8月至10月,先后有10余批,达1700人之多。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声明:“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②翌日,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政纲。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

① 《长沙文化城——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以下简称《长沙文化城》),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458页。

② 《申报》,1937年8月15日。

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两党团结抗日,为湖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条件。

平津沦陷,沪战发生,一些文化教育机关,纷纷迁入湖南。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联合成立了“临时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杭州艺专、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央日报社、国际新闻社、东方杂志社等陆续迁到湖南。一大批文化名人、教授、学者随之云集长沙,他们有: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胡愈之、张奚若、吕振羽、翦伯赞、范长江、陆诒、张天翼、谭丕模、曹禺、田汉、阳翰笙、郁达夫、沈从文、郑君里、周立波、艾青、谢冰莹、王彦西、张曙、丰子恺、钱君匋、张乐平、张伯苓、黄炎培、曾昭抡、陈垣、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叶公超、吴俊升、陈子展、朱光潜、王力、浦江清、贺麟、汤用彤、晏阳初、郑天挺、潘光旦、董每戡、吴祖光、孙伏园、蒋良牧、钱穆、李剑农、薛暮桥、许涤新、熊佛西、范寿康、刘彦、刘开渠、杨东莼、廖沫沙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在长沙从事过抗日救亡活动的有影响的文化名人约700余人。^①来到长沙,“不作战时古城的难民过客,而是抗日烽火的文化传人”^②,他们与湖南文化界汇合,积极投入救亡运动,长沙成了当时除武汉之外的中国“文化城”。^③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回湘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吕振羽回湘后,积极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他在湖南《公报》、《民国日报》、《中苏》半月刊、长沙《勤报》、《前进》周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共抗日方针,动员湖南人民参加救亡。

① 《长沙文化城》,第493页。

② 《任作民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③ 张力生:《“临大”、“湖大”抗战文化活动》,《长沙文化城》,第353页。

11月,徐特立和王凌波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延安来湖南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开展统战工作,参与组织和领导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同月,中共湖北省委派任作民回长沙。1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高文华、郭光洲等来湘成立湖南省委。徐特立是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身份来湘的。他来长沙后,以《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抗日十大纲领》为题,先后在长沙银宫电影院、省广播电台、长沙临时大学、国立戏剧学校、湘雅医学院、长沙青年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单位多次公开演讲,还常应邀参加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妇女界的各种小型座谈会。他注意上层统战工作,力促国民党湖南省党政当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

各地文化精英荟萃长沙,形成了以“外来户”为核心的长沙文艺界抗日文化大军。^①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明确了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全民众的精神武装和物质的武装同等重要”,主张实施“文化总动员”,“用集体的力量去担荷民族抗战的文化任务”。^②

10月17日,由吕振羽、翦伯赞、张天翼、孙伟、李仲融等55人发起,长沙教育、新闻、音乐、戏剧、出版等各界600余人集会,正式成立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该会由吕振羽、李仲融、翦伯赞、田汉、陈润泉等23人组成理事会,发表了《宣言》,指出:“湖南在空间的地理位置上,随着抗战的发展,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湖南境内的文化人,都应“消除一切党派的、门户的、地域的……种种自相摩擦的成见,在抗敌救亡这一最高原则下,大家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担负抗日救亡这一伟大使命。《宣言》还表示:“拥护全国最高领袖抗战到底”,“在本省党政当局共同指导下,发展救亡工作”。^③国民党湖南省党政当局赖琏、何键出席成立大

① 茅盾:《烽火连天的日子》,《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② 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缘起,《湖南日报》,1937年10月10日。

③ 《长沙文化城》,第401—402页。

会并讲话，希望湖南文化界“充实组织，积极团结，与全国文化界携手，以充实抗敌力量”。^①

湖南文抗会是“最活跃的团体之一”，它在湖南的救亡工作中起到了动员湖南民众的“先锋队、领导者”的作用。^②他们中间很多人是中共党员。次年2月，文抗会举行第二届会员大会时，人数扩大到1000人左右。它直接领导和影响的省会抗日团体有35个，与全省36个县建立了联系，在常德、岳阳、衡阳、桃源、湘潭、邵阳等地筹办了分会。^③当时长沙有影响的抗日报刊，如《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长沙《大众报》、《前进》周刊、《中苏》半月刊、《抗战文化》、《民族呼声》、《火线》以及湖南《大公报》、《民国日报》、《全民日报》等，其编辑人员大都是文抗会的会员。这些报刊，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突出抗日救亡的主题，是动员湖南民众救亡的号角。

除文抗会外，当时省城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团体还有：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湖南妇女抗敌后援会，长沙职业界抗敌后援会、基督教长沙青年会等等。它们的负责人多是文抗会成员。

上海失守南京沦陷后，湖南社会各界悲愤交集，大有“国破家亡”之感。然而何键主湘期间，一味“读经复古”，“行政机构，社会组织，教育方法”，“蹈常袭故，一切照旧”^④，不作实际有效的抗日御侮之临战准备。11月20日，国民政府改组湖南省政府，何键调离湖南，任命张治中为湘省主席。27日，张成立省战时设计委员会，制定《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以张治中为首的湖南省政府确定把组训民众、改革政治机构、准备自卫抗战作为施政纲要的重点。在实施各项抗战措施中，贯穿了“联共抗日”的方针，支持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参加

① 《湖南通俗日报》，1937年10月19日。

② 李仲融：《湖南文抗会之过去和现在》，湖南《观察日报》，1938年8月27日。

③ 《抗战文化》第四号会员大会特刊，1938年2月16日。

④ 范长江：《湖南对抗战之政治准备》，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20日。

和领导各抗日救亡团体。他对人说：“我们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①他主湘期间，同周恩来、徐特立、叶剑英、夏衍、田汉、范长江、薛暮桥、任作民、罗叔章等“公私情意都较深”，“始终和中共党员保持着亲密合作的关系”。^②

为加强湖南临战准备，增进民众现代国防意识和抗日自卫能力，1937年11月张治中上任不久，即成立了湖南民众抗日自卫总团，张自任总团长。县（市）设分团，乡（镇）设大队部。自卫团寓兵于民，平时生产维持治安，战时协同正规军守土保乡。在全省建立了30万自卫常备军，70万自卫后备队。12月13日，省政府成立了民众训练指导处，对全省民众进行抗日的政治、军事和组织的训练。省政府在长沙举办过两期民训干部训练班。第一期于1937年12月20日开学，集训大中学校教职员203人，高中学生3358人，大专学校学生801人。^③学员结业后，被派往各地组织训练民众。半年之内，在乡村训练了70多万民众。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任作民说：“张治中开办干部训练班，训练后派往各县工作，把革命的种子都撒播到各县去了。”^④

在开展民训工作的同时，湖南省政府于1938年3月底开办了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选拔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培训县、区、乡公职人员，以改造充实基层政权。第一期3000余人于5月结业，分派各地，更替了33个县长和大批乡、镇长；第二期学员毕业后，再次更替了25个县长，并对乡镇干部作了大幅度的调整。经过治理整顿，加强了全省民众抗日力量，增进了农村政权的活力。湖南充盈了战时空气。^⑤时论认为：“今天的湖南已开始有了新气象”，“当局

①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31页。

② 张素我：《张治中与湖南进步文化》，《长沙文化城》，第584—585页。

③ 参见张力生《“湖大”、“临大”抗战文化活动》；周德辉《长沙社会文化宣传活动概论》，《长沙文化城》，第356、389页。

④ 《抗战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45页。

⑤ 杨东莼：《抗战一年来的湖南》，《伊苏》半月刊第9、10期，1938年7月。

实施战时政治的决心……已为大多数民众所了解和拥护”。^①

为统一全省各抗日救亡团体，协调各党派之间的合作关系，加强全省的抗日自卫力量。经过协商，于1938年9月底成立了湖南省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张治中、覃振、徐特立、任作民、翦伯赞、杨东莼等为委员，推张治中为主任，张、覃、徐等19人为常委。这个统一委员会的成立，更有利于湖南以国共和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因国共合作和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的支持，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为以后支撑湖南战场的军事抗战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要作战区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的军事重心由武汉移到湖南。湖南由后方变成前线，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主要作战区。

湖南地处华中的战略腹地。据有湖南，可北攻武汉、东进浙赣、南护两广，西卫川黔，屏障陪都重庆。武汉、广州失陷以后，湖南的国防地位日见重要。1937年11月下旬，张治中一到湖南上任，即起草了《保卫湖南的国防计划》，提出在湘北营建国防工事，轮训扩充全省保安部队，组织民众自卫团，整顿地方政权，以防御可能从鄂南、赣西入侵湖南之敌。张治中此举，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支持。

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刚开始，国民政府驻武汉各机关开始撤离，党政机关迁往重庆。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军政部、军训部、军令部，以及海、空军总部、直属军事院校等，陆续迁

^① 范长江：《湖南对抗战之政治准备》，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20日。

到湖南。^①长沙、南岳一时成为军事指挥中心。同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加强长江以南防务，决定编组第九战区。以武汉卫戍司令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副司令长官，配备 52 个步兵师及若干特种兵和游击部队，布防赣北、鄂南、湖南，兵员之多，约为当时全国十大战区总兵力的 1/4。第九战区利用赣北、鄂南的“山地和湖沼”，卫戍武汉，固守江南防线。^②

10 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地处鄂、粤两省之间的湖南，战略地位更形重要。本来，敌人在实施夺取武汉的计划时，就包括进攻湖南。当时“广州、武汉既均入于敌人之手，则敌人侵略战争的进一步企图，便在于打通粤汉、平汉两线”，向南北两方深入“发展”。华南日军占领广州后，即“西犯佛山三水”，企图“攻略广西”；华中敌军夺取武汉后，即举兵南下，占领贺胜桥和汀泗桥，觊觎湘北。两路敌军，活动“都甚猖狂”^③，大有南北对进，夹攻湖南，打通粤汉路的势头。

面对敌军的侵略态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时指出：湖南的“长沙、衡阳，乃江南心膂和交通枢纽。敌攻略该地，是陷我国力于麻痹状态，削弱我尔后反攻之能力”，“有助于其尔后之南进。”^④因此要求九战区必须建立以湖南为重心的江南防务，屏障西南重庆，确保滇缅路交通安全。

10 月 24 日深夜，蒋介石离汉来长。他先后在长沙蓉园、衡山南岳召开部分高级将领和军政人员会议，部署湖南防务，并为南岳军事会议作准备。他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任命樊崧甫为总指挥，下辖八个纵队，利用三省边界“崇山峻岭之屏障”，及“有利于

① 《湖南近 150 年史事日志(1840—1990)》，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183 页。

② 《第九战区关于武汉会战之作战计划》(1938 年 8 月 5 日)，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图书馆合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 年内部发行，第 290—292 页。

③ 《武汉撤退后的抗战形势》，《新华日报》，1938 年 10 月 30 日。

④ 蒋纬国：《抗敌御侮》第 6 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68 年印行，第 56—57 页。

我、不利于敌”之地势，配合主力，抗击日军。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衡山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是担任长江以南防务的第三、四、七、九战区的高级将领，中心议题是制定江南防务计划，坚持持久抗战。会议总结了武汉会战的得失，讨论研究第二期抗战的准备与战略方针，确定整军方案，调整指挥系统，重新划定战区。在整个抗战的相持阶段，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过四次军事会议，湖南战场的作战，始终是会议的重要议题。

1939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薛岳为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在就职仪式上表示：“湖南占有东南地区最重要的位置，是抗战最有利的地位。我们今后的生命，只有放在湖南，湖南存则与之存，湖南亡则与之亡。”^①他上任后，即根据南岳会议的精神和第二期抗战的要求，加强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防务，集中30万兵力于战区，在赣西布置重兵，在湘北的新墙河、汨罗江到捞刀河构筑三道纵深防线，准备一旦日军犯湘，便在湘北地区节节阻击，渐次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反攻和歼灭敌人。

日军方面，自占领武汉之后，便计划进犯湖南，消灭第九战区中国军队的主力。1939年8月，武汉地区日军为打破华中局势相持局面，巩固和扩大其华中的占领区，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亦称“赣湘作战计划”），决定发动以湖南为主要作战区的战役。9月初，欧洲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进攻湖南的军事行动。4日，阿部内阁发表声明称：“当此欧战爆发之际，日本帝国将专致力于‘中国事变’的解决。”^②驻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执行以湖南为主要攻击目标的作战计划。9月下旬，冈村宁次将作战指挥部从武汉移到咸宁，纠集6个师团18万余人的兵力，从湘北、赣北、鄂南兵分三路大举向长沙进攻。敌我双方的军事部

① 薛伯陵将军言论初集》，第469—470页。

② 梁寒冰等主编：《中日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

署和作战计划,都把重点放在湖南。湖南成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国正面战场的主要作战区。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正面战场比较大的会战有13次,其中6次是在湖南境内,即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的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11月至12月的常德会战,1944年6月至8月的长衡会战,1945年4月至6月的湘西会战。湖南战场的每次会战,敌动员兵力5至9个师团不等,中国参战部队至少在9个军以上。^①6次会战,从1939年9月至1945年6月,持续时间长达5年又8个月。据199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四大会战》的资料统计,日军投入湖南战场作战的兵力先后有37个步兵师团80多万人,中国参战部队有160多万人。计:第一次长沙会战,敌参战有6个师团、长江舰队的海军、航空部队和特种部队,共18万人,中国军队30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5个师团、海军陆战队、航空部队伞兵共约12万人(亦说15万人),中国军队27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5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加上空军共12万余人,中国军队27万人;常德会战日军5个师团又3个支队,兵力10万人以上,中国军队26万人;长衡会战,日军9个半师团,20多万人,中国军队30余万人;湘西会战,日军5个半师团8万余人,中国军队20余万人。每次会战,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合计都在30万以上。湖南战场共毙伤日军257000余人。其作战时间之长,双方用兵之众,战争规模之大,伤亡之多,是其它战场所少有的。在湖南战场上,中国军队抗击敌军之勇敢和牺牲精神,也是出色的。如长沙会战,敌凭借其快速优势的机械化装备,陆、海、空配合,气势汹汹,分进合击。敌指挥官冈村宁次狂言:“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中国广大爱国官兵为保卫湖南,连日血战,两名师长阵亡,1名师长重伤,出现了胡春华、史思华等全营官兵壮烈殉

^① 参阅:《抗日战争会战经过概况表》,见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

国的英雄集体。^①常德保卫战中,广大官兵,奋勇杀敌,许国璋等3名师长战死。守卫常德城的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等8000余官兵,“抱定‘与城共存亡’,宁战死不投降之决心”,打退敌军3个师团5万余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毒气的配合下的连续进攻。12天的城垣巷战,守城将士寸土不让,一寸土地一寸血。常德城内,尸山血河。此役歼敌5000余人,杀伤更多。守军第五十七师6000将士,血染常德。^②在名震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第十军2万将士奉命死守衡阳。爱国官兵顶着烈日骤雨,寝食俱废,昼夜鏖战,打退日军4个师团多次凶猛的进攻,毙伤日军29200余人,敌中将师团长佐久间为人被击重伤,敌少将旅团长、参谋长及大佐数人被击毙。中国官兵喋血苦战,坚守47天,在中华民族反侵略的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③

湖南战场各次会战,对中国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对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长沙战役。当时,长沙是第九战区的指挥中心,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重镇,扼两广咽喉,控川黔门户。日军如占领长沙,可南攻衡阳,打通粤汉交通线;可西指常德,切断西南补给线,捕捉、消灭第九战区主力,将中国军队封锁在川、黔境内,压迫中国政府屈服。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守军拖住日军30多万兵力,时间长达2年又4个月,打死打伤日军14万余人,把敌人赶回新墙河以北,从而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占领长沙的企图,打击了敌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军民反侵略战争的斗志。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军打通粤汉线、牵制中国军队策应太平洋英、美盟军作战”的企图,开创了“中国正面战场战役反击的先例,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军连遭失败的形势下首创胜利的记

① 贺执圭:《记第一次长沙会战》,《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05页。

② 王仲模:《常德保卫战纪要》,《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333页。

③ 《衡会战综述》,《湖南四大会战》,第387—388页。

录。《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击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有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长沙战役，“配合了友邦作战”，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同盟军，与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战场“遥相呼应”。“此次长沙之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①英国《泰晤士报》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②蒋介石也称：“当此各国反侵略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能获得如此空前的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可以告慰于世界友邦”；“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③再如常德会战。常德是湘西北的门户，湖南的“谷仓”，是湖南西部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若日军占有常德，东可监视长沙、衡阳，西可制约四川东部，威胁重庆。为加强陪都重庆的防卫，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军委会把常德划归第六战区，1942年制定《第六战区拱卫陪都的计划》时，常德列为确保的首位。1943年10月，日军在太平洋地区作战失利。中国从川、湘等省抽调7个军转运云南、印度，准备协助盟军反攻缅甸和打通中印公路。日本侵略者为牵制中国政府运兵印、缅支援盟军，并策应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于11月初调集5个师团10多万人，进攻常德地区。中国第六、第九战区集中12个军26万余人，与敌苦战50余天，常德失而复得，确保了重庆的东面安全和补给线，也有效地支援了印、缅和太平洋地区盟军的对日作战。又如衡阳保卫战。衡阳是湖南第二大城市，是蒸水、耒水、湘江的汇合地，粤汉、湘桂两线的接轨处，也是西南公路交通的枢纽，水陆交通辐射四面八方。抗战时期，衡阳是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

① 《长沙保卫战与目前军事任务》，《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

② 转引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382页。

③ 《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页。

“一号作战”计划中，便把衡阳列为攻夺的重点。长衡战役开始的第三天(5月28日)，蒋介石便给守卫衡阳城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下达命令：“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军助弟完成空前大业。”^①第十军2万爱国官兵奉命死守衡阳，喋血苦战47个昼夜，拖住了日军5个师团的兵力，杀伤其大量有生力量，大大阻扰与推迟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湘西会战，是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的最后一次战役，目的在于占领“中国东线空军基地芷江机场，确保大陆运输线(中国到越南)的畅通，解除空中威胁”。^②芷江机场位于湘西雪峰山西麓，是中美空军作战的起落基地，有飞机400余架，它在轰炸日军在华军事设施，调运军队，配合中国陆军作战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日军此役，集中5个师团8万余人，由第二十军中将司令官坂西一良指挥。中国直接参战部队主要为王耀武指挥的第四方面军4个军11万余人。湘西会战前后两个月，日军伤亡28000余人。湘西会战后不久，中国军队乘胜收复桂柳。湘西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标志。

中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湖南省有着“21万多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三千万‘夙以忠勇勤朴称’的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缩毂南北，控制东西’的交通机关。这一切……使得湖南成为国防重镇与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据地”。^③湖南交通四通八达，矿产资源丰富，锑、锡、铅、锌、钨皆居全国前列，素有“世界锑都”和“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的美称。湘中、湘南蕴藏着大量的煤、铁。在八年抗战中，政府当局

① 姚少一：《血战衡阳脱险记(一)》，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 吴鸾等：《湘西会战纪实》，《湖南四大会战》，第629页。

③ 杨东莼：《抗战一年来的湖南》，《中苏》半月刊第9、10期，1938年7月。

和全省军民利用湖南的资源优势,动员全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全国抗战,为抗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

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即在湖南开始了一些国防建设的初步工作,1936年度的《国防计划》,即把湖南与鄂、赣、皖4省列为“警备区”。动工修筑湘川公路,勘察建造湘黔、湘桂两线,打通粤汉路的株衡段和衡广段。资源委员会派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来湘考察有色金属,派中央钢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机器厂的筹委会主任来湘勘定厂址,征地9000多亩。1937年2月,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的军事报告中,仍把湖南列为国防“警备区”。他在谈到国防建设事项时,根据湖南的资源优势,强调湖南的冶金、燃料、电气、机械等重工业的建设,并且放在鄂、川、桂、黔、赣、豫、陕等省的优先地位。1936年初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开始在湖南兴建湘潭钢铁厂(年产10万吨)、茶陵铁矿(供钢铁厂用)、湖南飞机发动机厂(年产100具)、谭家山煤矿(年产煤30万吨)、湖南铅锌矿(年产铅锌5000吨)、湖南模范炼锑厂(年产锑4000吨)、湘潭电工器材厂(生产电线、电话、真空管、无线电等)。这些厂矿的建设,为湖南工业“树立巩固之基础,以达自给之目的”。^①这些厂矿,是湖南近代工业的脊梁,也为抗战爆发后沿海工厂迁湘落户、开工生产准备了条件。为“普及国民兵役”,“维护征兵事务”,“掌理壮丁训练”,国民政府于1937年春起在湖南设置了衡郴、宝永、沅辰、长岳四个师管区,数目之多为苏、浙、赣、豫、鄂、川、黔、陕、桂各省之倍。^②师管区除为正规军征募壮丁、补充兵员外,它在帮助湖南地方当局开展抗日国防教育、“发动湖南的人力”、“组织民训”、“充实民族抗日力量”等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使沿海地区的工业免遭日军的劫掠

① 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1937年2月),浙江省历史学会《国民党研究资料丛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2册,第4页,第12—15页。

② 同上书,第23—24页。

和毁于战火,保存中国工业经济命脉和抗战的物质基础,国民政府加大了沿海工业内迁的速度和力度。湖南成了平、津、沪、宁等地工业经济战略转移的重要落脚点和中转站。1938年初,国民政府经济部制定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确定:在湖南建设“沅陵、辰溪为中心的电力、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衡阳为中心的轻工业区”。^①抗战头几年,湖南属大后方,局势相对稳定,经济运行正常,是沪、宁、汉工厂企业较为理想的内迁地。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12月,内迁大后方的工厂企业共304家,其中迁入湖南的有118家,占39%。^②1939年6月,内迁工厂上升为413家,其中迁湘122家,占29.5%。^③1940年底内迁工厂增至448家,其中121家迁湘,占27%。^④193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直接统辖的63家近代工矿企业中,有16家在湖南,占26%。迁湘工业中,机械类约占40%,纺织类约占22%,化工类约占13%,电器类约占6.47%。这些工业的存在和复兴,是国民政府持久抗战和稳定后方的经济基石,是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经济战的物质基础。发达地区大批工厂企业迁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工艺、设备和管理经验,使湖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到空前开发和利用,促进了湖南近代工业乃至其他经济空前发展和繁荣。衡阳、祁阳、湘潭、邵阳、沅陵、辰溪、洪江、芷江等县城,一时百业勃兴,工商辐辏,人口倍增,成了湘南、湘中、湘西新兴的工业区和经济文化中心。衡阳被誉为“小上海”,洪江有“小南京”之称。在这些城镇加工生产的钢材、弹药、镁粉、锰砂、通讯器材、军工制品以及医药布匹、食品等,有效地支援了前方抗战。

抗战初期,平、津、沪、宁等地一大批文化名人、教授学者云集

① 国民政府经济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1938年初),转引自: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

② 冯容:《抗战时期民营工厂辅助军需生产的一事实》,《民国档案》1986年第4册。

③ 国内工业之内迁,香港《工商日报》,1939年6月6日。

④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87—88页。

长沙, 他们与湖南文化界汇合, 高举抗日救亡旗帜, 在湖南办学校, 开书店, 编报纸, 出刊物, 组织救亡团体, 成立抗日剧社; 举办读书、演讲、歌咏、戏剧演出、巡回宣传等活动。在中国暂时失去原有的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文化中心城市后, 又涌现出长沙、桂林等抗日“文化城”。长沙大火后, 虽然他们大部分陆续转移到了昆明、重庆等地, 然而他们在三湘大地播下的爱国救亡种子, 在湖南人民心中点燃的抗日怒火, 确成了动员全省军民, 同仇敌忾抗战的巨大力量。

粮食、棉花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 经常把粮食、棉花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进行掠夺。湖南是中国有名的“谷仓”和主要产棉区之一。粮食产量: 1936年186.26亿斤, 1937年162.8亿斤, 1938年上升为207.88亿斤, 1940年128.9亿斤, 1941年126.3亿斤, 1942年167亿斤; 棉花收成: 1936年25.8万担, 1937年因受洪涝减至14.86万担, 1938年19.04万担, 1939年23.39万担, 1940年26.21万担, 1941年猛增至43.49万担, 1942年31.82万担。湖南为中国抗战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食和棉花, 也为西南、西北各省和后方机关输送了大量的民食和布匹。1944年3月, 薛岳在省政府行政会议上说: “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应军棉70000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担外, 尚须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①

抗战期间, 湖南是全国输送壮丁最多的省份之一。据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统计: 1937年8月至12月, 全国21个省共征壮丁1008310人, 其中湖南190505人, 占全国应征壮丁人数19%, 居全国第一; 其次是河南, 126964人; 四川103831人, 占10%, 居全国第三位。1937年8月至1941年8月4年间, 全国共征募壮丁9003256人, 其中湖南1262582人, 占总数的14%; 河南1344180

^① 转引萧栋梁等《湖南抗日战争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151、157、150页。

人,占总数的 14.9%;四川 1306039 人,占总数的 14.5%。^①然而,抗战时期河南人口总数 4000 多万,四川是 7000 万,湖南是 3000 多万。从人均负担兵役来看,湖南多于河南,远远超过四川。八年抗战期间,湖南应征入伍的壮丁共 2031357 人,占全国征募壮丁总数 13922859 人的 14.6%。抗战时期,湖南是抗日御侮的兵员大省。

据军政部军医署统计:1938 年底,军政部配置在全国各地的陆军医院总共 21 个,其中 5 个设在湖南;后方医院 162 个,其中湖南 45 个;重伤医院 12 个,其中湖南 3 个。湖南各医院伤兵收容量共计为 5.3 万人,占后方各省医院伤兵总收容量 14 万人的 38%。^②

在湖南战场上,先后有 100 万民众直接支援守军作战。他们组织侦察队、交通队、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帮助守军侦察敌情,布雷、毁路、破坏敌人水陆交通,运送军粮、弹药,救护受伤官兵,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湘北农民 4 万余人破坏公路 1230 余公里。衡阳工人、市民在保卫战中舍生忘死援助守军作战,其中“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 3174 名”。^③抗战后期,湖南民众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大小数百支,人数近 10 万。他们广泛开展游击战,配合正规军作战,打死、打伤日军数万人。湖南军民在近 6 年的艰苦抗战中,打死打伤日军共计 29 万余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称:在湖南抗日战场上,“将士忠勇用命,人民动作协同”。^④

日本侵略者在发动侵湘战争中,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破坏

① 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抗战以来各省征募壮丁人数统计表》(1941 年 12 月),转引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 3 册,第 118 页。

② 军政部军医署:《军政部现有卫生机关之数量及其收容量与分布概况表》(1938 年 12 月),转引同上书,第 2 册,第 181 页。

③ 衡阳《大华晚报》,1947 年 8 月 10 日,《衡阳文史资料》第 4 辑,第 26 页。

④ 薛岳:《在抗战中跃进的湖南》,转引萧栋梁等《湖南抗日战争史》,第 420 页。

军民的生存条件,企图摧毁湖南抗日的战略基地。他们在湘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洪山、营田、青山、厂窖等血腥屠杀;在常德等地绝灭人性地投放杀人的细菌;每天出动数十上百架飞机,狂轰滥炸城镇和乡村。古城长沙精华尽毁,湖南重镇衡阳留下焦土一片,常德仅有残垣断壁。全省76个县市,56个遭轰炸,被占领。全省军民伤亡262万多人,其中死亡92万余人,重伤170万余人。房屋被毁94.5万栋,损失粮食4000多万担,耕牛64万多头,各种损失价值121900多亿元法币。湖南军民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和财产支持了全民族的抗战。从抗战初期沿海、沿江地区工业经济转移湖南及科技文化人才大举入湘来看,从湖南人民为中国持久抗战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资源,以及为抗战胜利所作的奉献与牺牲来看,湖南堪称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荣维木)